

东亚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研究基础及其特征取向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East Asia

傅舒兰 | FU Shulan

摘要：针对东亚文化圈中经历了相似城市近代化历程的中、日、韩三国，涉猎各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相关的既有研究，选取构筑基础的代表性著作展开综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摸清东亚近代城市规划研究大致脉络与基础认知，总结并比较了三国研究的手法特征与价值取向。对于研究手法和价值取向的关注，旨在归纳可借鉴的研究方法、贡献于中国本土近代城市史与规划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同时，通过建立东亚三国的比较框架，也提供有利于理解他国学者研究价值取向的客观工具。

关键词：近代、东亚、城市规划、综述、制度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the urban planning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which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modernization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general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landmark studies and viewpoints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By comparing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study attempts to summarize research methods that are helpful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while providing objective comparison frameworks and tool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value of scholars in 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Modern times, East Asia, Urban planning, Literature review, Institution

包括城市实体空间营建与管理法制设计的城市规划，对城市近代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处东亚文化圈的中、日、韩^[1]（朝鲜）三国，均经历了引入近代城市规划、改变传统都城营造制度和治理方式、展开城市近代化建设和建立市政管理体制的过程。

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缘故，古代都城营造通常归属工部，治理则与户部、刑部有关，相关记载则一般可见于方志。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建立近代国家体制，其相应的空间体现——近代城市概念——也随之而入，东亚三国逐次开始其改造旧都城、建设新制度的实践探索。虽然各国对于“近代”^[2]时间段的主流定义各有侧重，但是如果从城市近代化的总体路径来看，仍具有

很大的共通之处，均有外国人聚居地（租借地）的前置引发和参考，均从道路改良开始建设实践和制度设计，再进而拓展建设范畴、引入更多种的技术方法，完成包括土地、规划、建筑等相关方面的制度设计。

当然，由于技术来源、接收土壤、条件基础等诸多差异，三国的的发展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因其疆土宽广、政权割据和更迭频繁等原因，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同时，由于近代化过程中的频繁互动，包括早期派遣使团和留学生、中后期的日本侵占等因素，使得东亚近代城市规划的引入与发展，体现出主要路径显著且具有相关性和可比性等特征。因此无论在哪国的研究中，其他两国都会因其历史上的影响和交

作者：

傅舒兰，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区域与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兼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奎章阁研究院KAFS Fellow [2018—2019]。

“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 “Chey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ternational Scholar Exchange Fellowship for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8—201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408533）；浙江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东亚互动视角下的中国城市近代化研究）

流,成为深入研究时无法回避的讨论对象。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三国既有的相关研究,选取形成各国研究基础的代表性著作及其学者观点^[3],摸清东亚近代城市规划研究的大致脉络与基础认知,比较和总结各国研究的手法特征与价值取向。其中对于研究手法和价值取向的关注,目的一则在于总结可借鉴的研究方法、贡献于中国本土近代城市史与规划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二是通过建立东亚三角的比较框架,提供有利于理解他国学者研究价值取向的客观工具。

一、日本研究的基础形成及其特征

日本关于近代^[4]城市规划(日文称“都市计画”)的研究,较早在1968年日本颁布新《都市计画法》与《建筑基准法》的背景下展开。目的在于围绕新法的修正需要,明确旧法制定背景、过程,重申特征性技术条款的价值和意义。^[5]研究在1980年代末期获得较大推进,形成了三位代表性学者从不同角度围合构造的研究基础:石田赖房及其近代城市规划通史的构建;渡边俊一及其关注技术来源的国际比较研究;越沢明及其二战时期日本海外规划实践的研究。

1. 石田赖房及其通史构建

石田赖房1987年出版的通史性著作《日本近代都市计画百年》^[6],是依照城市规划法制形成与变更为主要线索,进行分期的。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分为欧风化都市改造期(1868—1887年)、市区改正期(1880—1918年)、都市计画制度确立期(1910—1935年)、战时下都市计画期(1931—1945年)、战后复兴都市计画期(1945—1954年)、基本法不在·都市开发期(1955—1968年)等主要发展阶段,基本确立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的通史分期。同时,著作从制度设计——技术官僚层、土地区画整理、用途区域制、建筑线制度等方面进行勾勒的,也成为日本近代城市规划主要特征的基本认知。

从石田赖房个人的研究发展路线来看,不难理解其关注制度的研究特色。他从1950年代谋求解决农村住宅问题、回应农村与郊区土地整理规划等实际需求开始,就逐渐涉猎了“区画整理”手法、大都市近郊区规制等相关制度,讨论其特征与来源。随后又围绕1919年旧法的另一特征“建筑线”制度,展开了系列研究,于1979年开始陆续刊载。^[7]他系统梳理了从明治初年限制“庇地”开始,到导入“建筑线”、市区改正实践、1919年立法,以及持续影响导致1980年“地区计画”制度产生的整体过程。在此基础上,逐次展开对“土地区画整理”制度通史^[8],再进一步是近代城市规划通史^[9]的设想,最后完成了通史书写。

可以说,通史依照制度形成展开这一研究特色,既来源于规划实践的需求,也是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形成发展的最显著特征。

2. 渡边俊一及其英美比较

渡边俊一于1993年出版了代表作《“都市计画”的诞生——国际比较视野考察日本近代城市规划》。不同于石田赖房旨在诠释制度变迁及其特征要因的通史构造,他采用的是从关键节点切入、以小见大的研究手法。切入的节点是1919年,标志日本近代城市规划体系形成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颁布,习称“旧法”。著作从法律的术语来源(“都市计画”与欧美近代城市规划相关概念传入)、立法过程(包括了先期成立都市建筑法令调查委员会,到成立都市计画调查会直接讨论法案制定,以及法案调整改变到最后确定的全过程)、关键人物(土屋纯一、片冈安、池田宏的思想形成)、后期影响等方面,解读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体系的技术来源,尤其是欧美来源及其传入和本土化的路径,丰富和补充了以德国来源(“建筑线”“区画整理”)为传统的传统认知。

从渡边俊一个人的研究发展路线来看,也不难理解其关注英美比较的研究特

色。因为他在1960年代就开始围绕城市再开发的问题研究美国的规划分区制度。到1970年代陆续通过美国近代城市规划及其社区理念^[10]、英国城市规划关联法^[11]等题目,开展对英美城市规划制度形成史的研究。其对英美制度的深入理解,为随后开展的比较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田园城市在日本的传播^[12],到“都市计画”用语形成的考察^[13],再到1980年代开始提出系统的国际比较^[14]。同时,从关键人物、事件、关键词等个案切入的研究手法,也是较为凸显的特征之一。围绕1919年旧法的形成,就先后对关键人物片冈安^[15]、土屋纯一^[16],关键团体和事件的RIBA都市计画会议(1910)与建筑学会^[17]、都市计画调查会“池田·片冈论争”^[18]、“大阪市街改良法案”^[19]等展开个案研究。同时,对直接参与旧法制订的饭沼一省、樱井英记、岩井四郎、佐藤昌、松井达夫、财津吉文等当事者的访谈^[20],也可视为其推进规划史研究的促发性工作。

可以说,通过围绕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系统形成的标志性节点——1919年旧法颁布,渡边俊一通过以小见大(从关键人物、关键术语等切入)、国际比较等手法,较好地补充了通史叙事中对于关键性历史节点的诠释不足,以及英美来源等形成因素。

3. 越沢明及其海外研究

越沢明在1980年代末相继出版的《“满洲国”的首都计画》《哈尔滨的都市计画》等著作,是在日本海外调查及档案记录基础上形成的,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主要对象,刻画日本二战时期在海外占据地实施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实践。从其个人研究的发展路线来看,对于中国城市的关注起源于1970年代后期从事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调查:系统收集翻译了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农村规划、城市交通的资料,其中包括上海、大庆、肇庆、北京^[21]等城市的相关规划、土地政策与住宅政策^[22]。随后基于日本丰富的档案资料,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关于长春^[23]、伪满洲^[24]、北

京^[25]、上海^[26]、旅顺（“大东港”）^[27]、抚顺^[28]等日占时期的中国城市研究。1980年代后期推进到其他日占地区，如朝鲜^[29]、台北^[30]等。

越沢明通过城市个案研究的推进，逐步完成了日本新兴城市规划技术官僚层将本土无法推进的城市规划新技术，尤其是绿地公园规划，带入占据地区展开试验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的历史描绘。从研究手法来看，他基本上是从城市个案入手，针对单个城市，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梳理，进而考察规划方案制订、实施经过和建设成果。这种重视城市个案、关注建设成果的特征，可能源于个案城市丰富的档案资料以及现实中极高的完成度。但相比于前两位学者，越沢明不太关注与制度相关的机构或法规的研究，即没有从整体上考虑与日本本土相关制度的关系（移植成形的问题），或者进一步追究为什么占据地规划能得到极高完成度的原因。虽然作为占据地研究的延伸，越沢明在2000年代后开始讨论占据地实践经验对日本二战后本土“战后复兴”^[31]的贡献。

但总的来说，越沢明通过对海外日占城市个案研究的积累，补充了实际处于日本本土以外、却在近代直接受到日本影响、关乎全面审视和描绘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这一部分。但是这部分研究呈现出重视个案、不关注制度系统发展的特点，缺乏与同时期日本本土及其海外版图扩张与侵略构想连接的研究特点，存在价值取向的问题。同时也因其研究的先发优势及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本土近代城市规划研究的展开（图1）。

4. 研究特色及其影响

以上三位的研究，在1980年代末期综合构建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基础，勾勒出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大致流线：从雇佣欧美技师进行近代化改造开始，经历本土各主要城市的“市区改正”探索，在关键人物和团体的观点交汇冲撞后，由土木官僚主导进入全国性法规的制定，颁布了以

“建筑线”“土地区画整理”和“用途区域制”为主要技术特征的1919年《都市计画法》，奠定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的基础。随后在对外侵略战争兴起的背景下，都市计画法进行了多次改正，大都市圈规划、绿地规划、防空规划、围绕战时工业分散和“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意图的国土规划纷纷制定；与此同时，新兴的土木官僚又在二战期间踏足占据地区，将本土因地权纷争难以快速推进的城市规划构想投入实施，并在战后回国贡献于战后复兴建设。

从手法来看，这些研究形成了注重制度、机构等系统性要素的传统，为进一步推进节点研究提供了可供客观评估其阶段性意义的基准，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2000年以来出现了围绕重要事件和人物（比如“都市美运动”、石川荣耀、高山英华等），重要城市（东京、京都、神户等），以及日占租界和城市的个案与比较的深化研究。同时，其影响还体现在英语圈研究日本城市的主流学者著作中，包括实际跟随石田赖房学习的卡罗拉·海茵（Carola Hein）^[32]，以及《制造都市日本：江户时代到20世纪的城市与规划》^[33]的作者安德烈·索伦森（Andre Sorensen）。特别是安德烈·索伦森，在从国际视角不断推进技术发展与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要素：土地区画整理、内务省机构和土木官僚阶层等研究^[34]过程中，还将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引入规划史研究。

从价值取向来看，即便石田赖房已在著作先期提示“（占据地和殖民地）表面看起来是日本城市规划制度和技术的进步、达到水准也相当高，但最多只能视为殖民占据强权支配下的昙花一现”^[35]，对日本本土以外殖民占据时期的断代史研究，实际上还是在回避日本侵略本质、依照殖民时期“内地（日本本土）、外地（殖民地、占据地）”的地域观展开。这种取向和由此产生的认知，还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其体现为近期许多主流学者将二战后日本城市复兴规划展开归功于战时侵略实践的观点，并企图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技术形成的叙事版图扩张到本土以外，片面强调其积极作用。这种将强权军事支配下取得的实施成果，全部归功于日本近代城市规划技术进步的认知，是偏颇并需要予以谨慎辨识的部分。

二、韩国研究的基础形成及其特征

韩国近代^[36]城市规划形成相关的研究，几乎与日本同期，在1980年代末期取得较大进展。不同于日本由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围合构建的方式，韩国是由一位学者——孙祯睦，纵向贯穿始终、完成整体发展路径的勾勒。当然不排除早在日占时期就有关野贞《朝鲜土地制度》调查报告以及1960年代金泳镐^[37]、金容旭^[38]等的研究中，就已经出现了朝鲜城市近代化相关的内容。



图1：三位日本代表学者的著作封面

1. 孙祯睦及其分期研究

孙祯睦从1971年发表《城市的本质是历史与文明》一文开始,以朝鲜王朝、开国开港后的两段分期,推进对朝鲜传统城市人口规模、住民构成、交通控制、住宅、给排水消防、近代城市公共设施等各方面课题的研究。^[39]1977年,其以《朝鲜时代都市社会研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后出版^[40]),又于1982年出版了《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41]、《韩国开港期都市社会经济史研究》^[42]两册,1990年进一步追加日本档案并出版了《日帝强占期都市计划研究》^[43]。四册著作跨朝鲜时期传统城市社会与开港后近代城市社会,尤其是开港期与日据时期的研究,完成了韩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基本脉络的勾勒,奠定了研究基础(图2)。

孙祯睦的研究,勾勒出了朝鲜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大致流线:在进入近代化之前,朝鲜王朝依照“府邑”层级体系建设和管理城市,并在首府汉城施行了通行禁止、道路(“假家”)、消防等相关管理制度。在朝鲜王朝末期,朝鲜被迫开港开场,先后在日本专管租借地、共同租界、罗南和镇海港等地开展近代规划和建设。到1910年朝鲜半岛与日本合并,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日设“朝鲜总督府”为建立新统治秩序,开始依照日本办法在京城施行“市区改正”,进行道路整理拓宽、市街地建筑取缔、重要官厅建筑物所在地规划等近代化改造。随后又在1919年日本颁布《都

市计画法》的背景下,在京城、元山、大邱等地开展了近代城市规划、《朝鲜都市计画令(草案)》制定等探索。此后,在日本入侵东北、对华全面开战的背景下,颁布1934年的《朝鲜市街地计画令》,逐次在重要的战备枢纽(罗津、清津、城津)和首都京城等23个城市适用。1945年二战结束后,该《朝鲜市街地计画令》仍继续适用于24个城市,直到1960年。

2. 研究特色及其影响

以上孙祯睦的研究,贯穿了探求城市制度根源、解释法令形成过程与原因的关注点。这种关注制度形成的研究视角,与其法学出身的背景^[44]以及与日本规划学界的密切来往^[45]都有直接关系。除了注重法制形成,他的研究还有另一特征是强烈的比较意识。其对朝鲜近代城市规划形成的阐述、定位,均在不断与日本和中国的比较中展开。这种手法特征,一则源于事实上朝鲜王朝及朝鲜近代化过程中,中、日两国的直接作用和影响,一则也提示了通过建立三角比较框架建立史观这一有力的客观工具,对此后韩国相关研究均有影响。1990年代以后,除了韩国本土出现比较分析韩国与日本城市规划制度的博士论文^[46],日本学者也开始进一步加强对二战时日占地区的研究。目前可见较为专注于朝鲜研究的五岛宁,就是在孙祯睦勾勒的流线上,从首尔的道路构成、行政区域,

日据时期朝鲜总督府和朝鲜宫的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首尔近代城市规划的内容、规划前后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变化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梳理。^[47]目前还陆续修正和补充孙祯睦、越沢明等学者既有研究,刊发关于朝鲜、中国台湾、旅顺(关东州)^[48]等日据地区的论文,并有意识地展开比较^[49]。

从价值取向来看,孙祯睦作为直接经历日本占据的一代学者,在行文过程中并没有避讳其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感,直言近代日本在朝鲜建立城市规划制度的出发点和根源,在于更好发动战争完成其所谓“大东亚”构想的侵略意图。但是,对日本存在过于强烈的意识,也使其忽略了朝鲜王朝末期建立大韩帝国的短暂自立和探索,在其著作中对这段只是略作涉及一并带过,为此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围绕大韩帝国时期城市规划探索的补足性研究^[50]。目前转向朝鲜自身近代化选择的研究趋势,改变了以往以日本占据为主的视野和取向,但也存在忽略他国影响、片面强调朝鲜自生传统的情况;同时还有大部分研究专注首尔,对其他城市研究不够^[51]的问题。

三、中国研究的基础形成及其特征

相比中国古代都城,近代^[52]城市研究开展相对较晚。^[53]但相比于日韩在1980年代才形成了研究基础这一事实,中国对近代城市相关的普查和归纳整理开展较早,于1950年代已伴随建筑学领域对城市中近代建筑的关注而展开^[54],并伴随1960年代出版的建筑史教科书,具备了雏形。但系统性的梳理与内容扩充,即专门关于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的研究基础,还是在第二个阶段1980年代《中国城市建设史》出版后,才得以巩固成形。

1. 两个阶段的教科书编写

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的教科书编写成果,首先体现在1959年成稿、1962



图2: 孙祯睦的三册代表作封面

年出版《中国建筑简史》^[55]。从简史的构造来看，基本依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取向，依时序对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的城市与建筑，按功能分类，注重介绍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和建设。对于近代城市^[56]，简史将其分为新、旧两种类型——“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旧城市的新变化”，强调近代产生的新变化。这种依照功能分类以及对“新”的强调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相关教材编写和研究，包括目前公认为奠定中国城市规划史基础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

第二个阶段，1982年初版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由同济大学董鉴鸿主持，从1961年开始编撰工作。^[57]其中对于近代的部分，也是依照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中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将近代城市分为因“租界”发展的城市、外国独占的城市、因近代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地等类型进行阐述。^[58]同时期出版《中国建筑史》也使用了相似的分类方法^[59]，且同样将主要视线集中到“新城市”，包括外来驱动主导下展开规划建设的近代城市（例如上海、哈尔滨、武汉、广州等），或者由于特殊时期、特殊因素引起巨变的城市（例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南京，随着工矿业兴起的南通等）。对旧城更新虽然也有提及，但由于其“变化很小”，就没有能够得到相应的重视。

通过《中国城市建设史》与《中国建筑史》城市部分的书写，对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这个议题，基本上形成了重视研究新兴城市，并按照功能及驱动力进行分类的基本结构；其作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成为全国通用大学教材，对此后国内展开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影响深远而广泛。

2. 研究特色及其影响

在上述研究基础的影响下，中国近代的城市规划通常是在以下两块比较突出的内容和范畴中展开：各地租界和东北的日据城市、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执政时期的城市，体现出关注个案城市中具体开展规划工作的特征，通常从城市规划方案制定、实施和影响这三个方面切入。同时在历史与地理等其他学科不断介入并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影响下，于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

研究出版的小高潮。包括：大量个案城市建设志的重编、增订；全国总述性的通史研究，如多次修订再版的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2008年李百浩与郭建共著《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等；以及从形态、地理、制度等各方面切入个案城市建设的研究成果（陈泳，2006年；王亚男，2008年；魏枢，2011年；邹涵，2011年；邹东，2012年；李彩，2012年；王骏，2013年等^[60]）。

但是，如果与前述的日韩进行比较，中国研究重视城市空间实体相关的规划建设，不太关注与整体发展流线描述相关的组织和系统构建（机构、法制等），这一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虽然以上提及的2008年《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第七章中，从城市规划与市政管理机构、规划与建筑法规、其他相关法规制度、战时体制与城市规划共四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规划制度”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出现了若干讨论重要案例城市上海的城市立法^[61]，或者试图通过上海、北京、南京来勾勒中国近代城市法律文化概貌^[62]的研究，但是，由于传统重视城市分类和空间营建的研究惯性，加上深入的个案城市研究尚未能覆盖全国，因此近代城市规划管理法制形成，特别是其与现当代规划体系联系等的总体面貌，仍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当然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教科书编写形成的传统分类定式，以及海外前置出现注重运用原租界、殖民地关系史料的个案研究（越泽明，1988年；越泽明，1989年；Warner，1996年；Cody，1996年等^[63]）影响外，还有其客观原因。中国广阔的疆域与近代政权的频繁更迭，导致了实践本身的片段性，缺乏清晰发展流线，甚至有近代是否形成了城市规划制度的疑问。因此，从深入个案城市研究开始，进一步丰富基础资料的研究现状，也事出有因。特别是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开始关注一般地方的城市近代化（Skinner，1977年；Esherick，2000年，包慕萍，2005年；Carrol，2006年；傅舒兰，2011年等^[64]），这一趋势逐渐弥补因传统教科书定式带来的对一般地方城市近代化研究不足的问题。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因1980年代研究基础结构的影响，仍存在传统分类定式的影响。从研究手法来看，重视个案研究的特点也十分显著，总体发展路径仍待描绘，但已呈现出多学科视角、多案例覆盖围合的发展趋势。

四、综述

从以上整理来看，中、日、韩三国关于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相关研究的基础，首先在城市规划史、建筑史、城市史等专门史领域展开。日本与韩国较早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进入研究高峰，各自出现了具备影响力的学者及其代表作品。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体现出注重揭示制度形成原因、注重通过比较进行自我定位等特征。相比而言，中国研究虽然经历了1960年代、1980年代、2000年代等多次总结性的成果呈现，但受传统研究的教科书定式影响，领土广阔、地方差异显著、近代政权更迭频繁等客观原因，仍表现为个案类型研究的深度加强，但覆盖度仍不足以支撑总括性全景的描绘，尤其缺乏对制度形成——这一关乎城市规划发展路径和系统构建要素——的研究。当然这种日、韩两国重视制度形成、中国重视空间建设的研究特点，不仅来源于或者说反映了各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起步阶段的差异，也与二战后分属不同阵营、形成了不同的当代国家体制有关。^[65]

最后，从进一步开展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研究的可能性来看，完善综述、剔除重复性工作，克服档案逸散等客观存在的障碍、利用多样材料深入挖掘个案，仍是增强基础研究积累的必须过程。但在个案研究过程中，如何深入挖掘、避免成为资料收集整理，则可以借鉴日本、韩国既有相关研究的手法：一则加强关注空间形成背后的人物、机构乃至制度的形成；二则通过客观存在的历史关联，有意识地通过比较来进行自我定位。当然在阅读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写作时，也应注意辨析作者的价值取向，辨识研究手法和理论的局限，避免以论带史。

注释

[1] 由于北朝鲜资料较难获取，本文讨论以韩国获取的资料为主展开。

[2] 近代的区分，源于欧洲史三段区分——古代(古典时期 Classical Antiquity)中世(Middle Ages)近代(Modern

Era)，其中的“Modern”，指向离当前较近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近代进一步分化为“近世”(Early Modern)、“近代”(Late Modern)、“当代”(Contemporary)。但到了东亚，由于文明基础、发展阶段以及历史观的差异，采用的历史分段法不尽相同。中、日、韩三国对近代的区分，虽然都可近似等同于细分后的“近代”(Late Modern)，但关键的时间节点均有不同。

[3] 本文并无意覆盖和提示所有的既有研究，而是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形成各国研究基础的代表性著作及其学者观点上。原因一则是避免事无巨细的罗列，反而模糊了主要特征；同时也因为关注点在于主要研究特征及其价值取向上，通常奠基性的研究和著作一旦成型，对后期研究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将其作为本文讨论的主体。

[4] 日本史的分段，由于学派较多仍存争议，但总体上借鉴欧洲史划分四段：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近代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的理解较为主流，但也有从1854年日本打开国门的《神奈川条约》签订开始定义的提法。对于近代的结束则没有固定的认识，有对应三段区分的近代概念认为近代一直延续到当下的，也有对应二战结束这个重要节点，认为二战结束是当代日本的开始。

[5] 芳垣良一郎，旧都市計画法・市街地建築物法制定当時の経緯について[J]，建築雑誌，1970(1019)：17。

[6] 石田頼房，日本近代都市計画の百年[M]，自治体研究社，1987；后增加内容，先后以《日本近代都市計画史研究》(1992年)、《日本近現代都市計画の展開，1868-2003》(2004年)为名出版。

[7] 《総合都市研究》1979年到1983年，连载8篇“建築線制度に関する研究”。

[8] 石田頼房，日本における土地区画整理制度史概説1870-1980[J]，総合都市研究，1986(28)：45-87。

[9] 石田頼房，日本近代都市計画史の全体像と時期区分[J]，都市計画，1986(144)：30-33。

[10] 《都市問題》1974年到1975年开始连载“米国近代都市計画の成立背景”(2篇)、“米国近代都市計画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ティ理念”(8篇)。

[11] 《地域開発》1976年的连载“イギリス都市計画の関連法の系譜”(3篇)。

[12] 渡辺俊一，日本の田園都市論の研究-1-田園都市株式会社(1918-28)の場合[J]，都市計画別冊，1977(12)：151-156；渡辺俊一，日本の田園都市論の研究-2-内務省地方局有志(編)「田園都市」(明治40年)をめぐって[J]，都市計画別冊，1978(13)：283-288。

[13] 渡辺俊一，用語としての「都市計画」の成立過程に関する考察[J]，都市計画別冊，1980(15)：19-24。

[14] 渡辺俊一，比較都市計画研究の視点と方法(国際交流と都市計画〈特集〉)[J]，都市計画，1982(123)：7-13。

[15] 渡辺俊一，片岡安の「都市計画運動」に関する史的考察[J]，都市計画別冊，1984(19)：229-234。

[16] 渡辺俊一，欧米近代都市計画との遭遇：土屋純一「タウンプランニングに就て」[J]，建築雑誌，1986(1254)：60-61。

[17] (旧)都市計画法・市街地建築物法の成立と展開に関する研究(1)：RIBA都市計画会議(1910)と建築学会の対応[J]，都市計画，學術講演梗概集，計画系，1984(59)：2267-2268。

[18] 渡辺俊一，片岡安の都市計画論とその成立経緯——都市計画調査会での「池田・片岡論争」との関

連において[J]，都市計画別冊，1984(19)：229-234。

[19] 渡辺俊一，旧都市計画法の成立過程における「大阪市街改良法案」の位置[J]，都市計画別冊，1987(22)：109-114。

[20] 《新都市》杂志1983—1984年的“先輩に聞く”系列连载。

[21] 《都市計画》杂志1978—1980年连载我国的城市规划现状相关资料(7篇)。

[22] 《都市問題》杂志1980—1981年连载中国土地政策与住宅政策(7篇)。

[23] 越沢明[解説]，長春の都市計画(〔長春の都市建設〕)[J]，中国研究月報，1979(373)：33-37，图1枚。

[24] 越沢明，満洲の都市計画事業——土地公有化と土地経営(昭和56年度日本都市計画学会學術研究発表會論文集16)[J]，都市計画別冊，1981(16)：97-102；越沢明，日本都市計画学会論文奨励賞「満洲の都市計画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昭和57年度〔日本都市計画〕学会活動状況報告)——(昭和57年度日本都市計画学会賞報告)[J]，都市計画，1983(127)：24-26。

[25] 越沢明，日本占領下の北京都市計画(1937—1945年)[J]，日本土木史研究発表會論文集5，1985：265-276。

[26] 越沢明，日本占領下の上海都市計画(1937—1945年)(昭和60年度日本都市計画学会學術研究論文集1)[J]，都市計画別冊，1985(20)：43-48。

[27] 越沢明，大東港の計画と建設(1937—1945年)[J]，日本土木史研究発表會論文集6，1986：223-234。

[28] 越沢明，撫順都市計画(1905—1945年)-上-ある植民都市の計画と建設[J]，地域開発，1986(266)：40-55；地域開発，1986(267)：24-43。

[29] 越沢明，朝鮮半島における土地区画整理の成立起源[J]，日本都市計画学会論文集，1986：115-120。

[30] 越沢明，台北の都市計画，1895—1945年[J]，日本土木史研究発表會論文集7，1987：121-132。

[31] 在2000年代以后出版了《复兴规划》《后藤新平》《大灾害与复兴规划》等著作，旨在讨论二战海外实践对本土的影响。

[32] Carola Hein，Japanese Cities in Global Context[J]，Journal of Urban History，2016：1-14，DOI：10.1177/0096144216635775。

[33] Sorensen A.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London: Routledge, Nissan/Routledge Japan Studies, Series Editor J.A.A Stockwin, 2002 (paperback edition 2004)：386。

[34] Sorensen A. Urban Plann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Japan: The Role of the Taisho Period Home Ministry in Japanese Urbanisation and Planning[J]，Planning Perspectives，2001，16(4)：383-406。

[35] 石田頼房，日本近代都市計画の百年[M]，自治体研究社，1987：179。

[36] 韩国史的分段有两种较为主流的认识，一种是通过朝鲜半岛分裂或统一的特征进行时期划分，另一种是采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的分段。对于后一种有近代分段的，时间上将近代定义为1897年建立大韩帝国开始，1945年二战结束，脱离日本统治为结点。由于1905年签订日韩《乙巳条约》，1910年签定《日韩合併条约》，其中涉及长达35年的日本

占据统治，朝鲜的近代带有非常强烈的日本色彩。

[37] “朝鮮後期에 있어서의 도시商業의 새로운展開” 韓國史研究 2卷, 1968; “近代都市化의歷史的起點” 都市問題 2卷8號, 1967.

[38] “釜山開港의比較史的意義”, 港都釜山 5, 1966; “釜山開港後韓國各港의研究” 港都釜山 6, 1967; 韓國開港史, 瑞文庫, 1976.

[39] “都市의本質과歷史 및 文明에 관하여”, 其他具体论文清单可参照“著書論文研究物”孙祯睦. 韓國現代都市 의 발자취 [M]. 一志社, 1988.

[40] 孙祯睦. 朝鮮時代都市社會研究 [M]. 一志社, 1977.

[41] 孙祯睦. 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 [M]. 一志社, 1982.

[42] 孙祯睦. 韓國開港期都市社會經濟史研究 [M]. 一志社, 1982.

[43] 孙祯睦. 日帝強佔期都市計畫研究 [M]. 一志社, 1990. 日译本《日本統治下の朝鮮都市計畫史研究》, 柏書房, 2004.

[44] 孙祯睦是二战后法学科大学毕业, 1950年代参加行政考试从政, 履任地方到中央. 1960年代围绕地域开发的问题展开研究, 从1965年开始承担大都市圈交通、首都制度、行政区域改编、国土计划等课题, 1966年创办《都市问题》杂志, 1968年调任建设部中央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 1971年兼任首尔市都市计划局局长(后专任)等。

[45] 1966年考察日本地域开发, 1970年日本万国博览会以及陪同首尔市长考察日本地铁建设, 1980年赴日收集开港时期资料, 1986年赴日参加日本都市计画学会(1987年《都市计划》都市计画史特辑)等。

[46] 李明圭. 韓國과 日本의 都市計劃制度의比較分析에 關한 研究: 朝鮮市街地計劃令과 日本의(舊) 都市計劃法을 中心으로 = A Comparative study on Korean and Japanese urban planning law [D]. 서울: 서울大學校 大學院, 1994.

[47] 五島寧. 日本統治下「京城」の都市計画に關する歴史的 研究 [D]. 東京工業大學博士論文, 1996.

[48] 五島寧. 朝鮮市街地計画令の立案過程に關する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04, 39 (3) : 919-924; 台灣都市計画令の立案における委任立法制度の影響に關する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12, 47 (3) : 529-534; 日本統治下台北における近代都市計画の導入に關する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09, 44 (3) : 859-864; 關東州計画令の土地利用規制に關する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15, 50 (3) : 794-799; 等等。

[49] 朝鮮市街地計画令と台灣都市計画令の特長に關する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14, 49 (3) : 513-518; 日本植民地都市計画に見る傳統的計画原理の取扱に關する論說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06, 41 (3) : 893-898; 五島寧. 外地都市計画法令の比較研究 [J]. 都市計画論文集, 2017, 52 (3) : 907-914.

[50] 金光宇 (김광우). 大韓帝國時代の都市計劃 (대한제국시대의 도시계획) ——漢城府都市改造事業 [J]. 郷土首爾第 50 號 (향토서울 50 호), 1991; 禹东善. 韓國の近代における建築觀の変遷に關する研究 (韩国近代建筑观变迁研究), 东京大学博士论文, 1998; 李奎喆. 大韩帝国汉城府都市空间再編 (대한제국기 한성부 도시공간의 재편) [D]. 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51] 目前可见地方城市研究较少, 有若干涉及釜山和庆州的研究. 大多在日本发表: 許亨亨. 韓國釜山の都市形成過程と都市施設に關する研究 [D]. 京都大學博士論文, 1993; 韓三建. 韓國における邑城空間の変容に關する研究: 歴史都市慶州の都市変容過程を中心に [D]. 東京大學博士論文, 1994; 曹榮煥. 近代の韓國・釜山における市街地の変遷に關する研究 [D]. 工学院大學博士論文, 2005.

[52] 目前中国史的分段, 基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思路, 分为古代、近代、当代三段. 其中近代是从象征封建社会崩溃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3] 20世纪初, 随着地理学(1910年代中国地学会)、考古学(1920年代燕京考古学社)、建筑学(19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引进, 就逐渐展开对中国古代都城的考察和研究。

[54] 刘先觉. 中国近百年建筑 [D]. 清华大学, 1956.

[55] 中国建筑史编撰委员会. 中国建筑简史 (第一册中国古代建筑简史, 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M].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62.

[56] 第二册中国近代建筑简史, 第一章“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57] 单颖文. (董鉴鸿专访) “90后先生”与“60岁学刊” [J]. 文汇报文汇学人增刊, 2017-10-27.

[58]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 中国城市建设史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59]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 中国建筑史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60] 陈泳. 城市空间形态类型与意义: 苏州古城结构形态演化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王亚男. 1900-1949年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魏枢. “大上海计划”启示录: 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进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邹涵. 香港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研究 (1841-1997)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邹东. 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研究 [D].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李彩. 重庆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历史研究 (1876—1949)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2; 王骏. 行政主体视野下的沈阳近代城市规划发展研究 [D].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61] 孙倩. 上海近代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及其对公共空间的影响 [D]. 同济大学, 2009; 王立民. 中国城市中的租界法与华界法——以近代上海为中心 [J]. 比较法研究, 2011 (03) : 1-11.

[62] 牛锦红. 近代中国城市规划法律文化探析: 以上海、北京、南京为中心 [D]. 苏州大学, 2011.

[63] 越泽明. 满洲国的首都计画 [M]. 东京: 日本经济评论社, 1988; 越泽明. 哈尔滨的首都计画 [M]. 东京: 总和社, 1989; Cody, Jeffrey W. American plann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37 (中华民国时期的美式规划) [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6 (11) : 339-377; Torsten Warner. Die Planung u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Stadtgrundung Qingdao in China (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M]. Main: Der Umgang mit dem Fremden Aus Frankfurt, 1996.

[64]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晚清中国城市) [M]. Univ Microfilms Intl, 1977; Joseph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重塑中国城市: 现代性与国家性) [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包慕萍. 蒙古城市建筑史——游牧与定住的双重城市呼和浩特 [M]. 东京: 东方书店, 2005; Peter J. Carroll. 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ng Suzhou, 1895-1937 (天堂与现代之间: 再造苏州)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傅舒兰. 中国·杭州における「山水都市」の創生に關する都市計画史的研究: 西湖の風景を都市に取り込む都市計画プロセスを中心として [D]. 東京大學, 2011.

[65] 比如由于土地公有制的原因, 在日本和韩国作为城市规划起步工作, 也是城市规划之所以涵盖制度设计最重要理由——地权整理的部分,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中鲜有涉及, 因此中国研究中较少将制度纳入考虑的范畴,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图片来源

图1、图2: 作者自摄